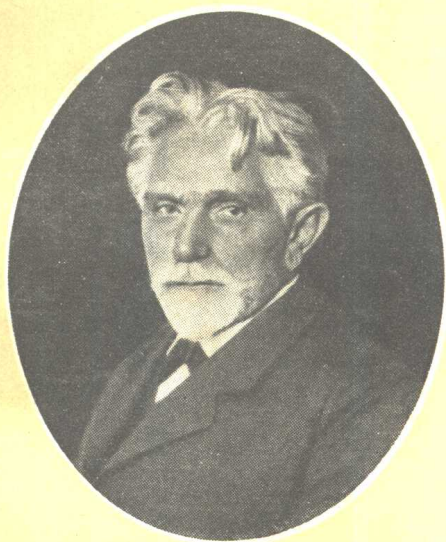




倍倍爾自傳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倍倍爾自傳

湯 行 健 譯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AUGUST BEBEL

MY LIFE

T. Fisher Unwin

London, 1912

根據英國費舍·安文書店一九一二年英文節譯本譯出。英譯者未署名。

倍倍爾自傳

湯行健譯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5號

北京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1175·787×1092 1/32· $\frac{1}{4}$ 印張·141,000字

一九五六年一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1—4,000 定價：(6) 0.64 元

出版者說明

奧古斯特·倍倍爾(一八四〇——一九一三年)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的創始者與傑出的活動家之一。他在從事活動的初期，曾在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領導之下，對世界工人運動有過巨大的功績。他後來雖然犯了中派主義、即隱蔽的機會主義的錯誤，但是直到他逝世為止，他却始終保持着對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信心和忠誠。

本書譯文係根據英文節本譯出。作者在書中從一八四〇年寫到一八七八年秋為止，敘述了上一世紀德國工人運動的興起，德國社會民主黨的創立和成長，以及作者本人成為社會主義的最熱誠的信仰者和革命家的經過。

序 言

給英文版的讀者

我高興地答應我的出版者的請求，來利用我的英文版的回憶錄的序言，跟讀者說幾句話。

我想，回憶錄的目的在於向大眾說明在某一時期中和某一行動範圍內起了重大作用的人所受動機與環境的影響，並有助於更清楚地了解某些當時的事件。

我個人的信念，就是，即使是一個最卓越的和最有力的人物，往往也是被推動的，而不是推動力；他所能做的，只不過是在某一既定的社會狀態下，在勢必被承認與實現的事上，加上些助力，促其實現罷了。我既有此信念，乃使我免於自視一己的作為是大過於一個自願促成一件新生事業的助成者的，而他對於這種新生的根源，也是全然無知的。

我的生活環境把我投入於一段歷史演進過程中的一個助手的地位，同時這也是我的經驗的一種後果。一旦被投身於這起源於上一世紀六十年代的德國工人階級運動之中，我的責任與興趣，不但使我參加在這運動中所產生的意見的爭執之中，並且也使我去省察當時新湧現的思想觀念，並且要盡可能地來公平決定，我是贊成它們還是反對它們。這樣，就在幾年的過程之中，我由一個堅決的社會主義反對

者變成爲它的最熱誠的信仰者。我過去是一個掃羅而現在變成了一個保羅；甚至直到我的暮年，我仍保持是個保羅，而且還愈益堅信我的信念是正確的，因而只要我活着，我仍將是個保羅。

由於過去五十年在大規模的資本主義的基礎上工業發展的結果，所謂羣衆的無產階級化正在穩步地前進，並且引起了一種不斷加深的階級對抗，產生了人類中這樣的一個階級，它的利益與現存的經濟制度的衝突變成空前未有的尖銳，並促使他們進入社會民主主義的行列——現代工人階級。若沒有這巨大的經濟發展及其後果，我與那些有相同信念的人，也許仍能用天使們所使用的語言說話，可是這些話是不會產生任何效果的。由於這樣發展的結果，無論如何，我——並且我並不全部否認在這件事上個人的功績——經某些人的幫助，成了德意志社會民主黨的領導者，這個黨在今天是世界上那種色彩最強的黨；它直接或間接同時影響德意志帝國的對內與對外政策的黨，其影響之大，實在遠超過了它的對手所肯承認的。帝國的故總理卡普里維伯爵是當時唯一的一個政治家肯老實承認政府在準備每一個提交帝國議會的法案，都得考慮過對於社會民主主義的可能影響。並且沒有一個熟悉德國情況的人會懷疑：若沒有這樣一個强有力的社會民主黨存在，德意志的外交政策更不知要多麼蠻橫。

這書也許可能引起英文版讀者的興趣，從這些回憶錄中可知道德意志社會民主黨怎樣達到了今日這樣有力的地位。目前這一段回憶錄記到一八七八年秋爲止。那時經過

兩次謀刺威廉皇帝以後，俾斯麥親王乃以爲這時正便於敦促帝國議會通過一套高壓法案；這一套對付社會民主黨的辦法維持了十二年以後（直到一八九一年）證明完全無效，斷送了的是親王自己的宰相職位。

俾斯麥親王曾希望這套法案，即令不能鎮壓住這個黨的發展，至少也可以阻滯它的發展。可是他注定要親眼目睹，把這個黨的組織及報紙禁壓了以後，這個黨所能有的票數却從一八八一年的三十一萬二千票增加到一八九〇年的一百四十二萬七千票。到那時候，已是德意志最強大的黨了。這種勢力的增長完完全全說明了他的壓制立法不但是無效的而且是多餘的。被擊敗了的不是社會民主主義而是俾斯麥。他的被免職標誌着他的失敗。

這情勢表明在反社會主義法之前，使我們的宣傳一再成功的那種力量，在這法律條例實行後，仍在繼續起着甚至更大的作用。並且直到今天它們仍在起着作用，這可由一九一二年一月間，帝國議會最近一次的選舉來證明，當時這個黨所得的票數不下四百二十五萬票，有一百一十個代表選進了帝國議會。這事實，從黨員百分之九十九是工人這點上看來，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這樣發展的特徵乃是從一八八一年以來——這日期是在反社會主義法下的第一次競選——雖然本黨代表的議席數目有所增減，票數却一直是在穩步地增加；這一點，本黨視爲有着決定性的重要意義，這是黨的成長的真正的標幟，並且是黨已較以前更深地在下層階級紮根生長的確實標記。

這成功之可能完全繫於以啓發羣衆爲目的的緊張而不

斷的宣傳；這種工作需要大量的時間、精力、錢財的犧牲與一個偉大組織的創建，反過來，唯有各種力量的合作才能得到這種結果。我也不否認，我已把我的全力貢獻給了這次成功。

奧·倍倍爾

一九一二年六月舒恩堡—柏林

目 次

序言

第一章	童年與少年時期.....	1
第二章	學徒與職工生活.....	12
第三章	我參加了工人運動與公共生活.....	21
第四章	拉薩爾宣言及其後果.....	27
第五章	德意志工人會社聯合會.....	30
第六章	斯圖加特城大會：威廉·李卜克內西.....	37
第七章	一八六六年的災禍·一八六六年的戰爭及 以後.....	45
第八章	德意志工人會社聯合會的進展·我私人的 瑣事.....	58
第九章	紐倫堡大會.....	64
第十章	工會運動.....	71
第十一章	我的第一次判罪·“國際”與拉薩爾派的 糾葛.....	76
第十二章	施維澤爾與他所領導的無產階級勞工 運動.....	79
一	傳記.....	79
二	“社會民主黨人”報.....	84

三 施維澤爾——一個議會的雄辯家與全勞工聯合會的獨裁者	91
四 巴門一易北菲爾大會・全勞工聯合會內部對施維澤爾的反對	96
五 愛森拿赫大會・社會民主勞工黨的成立及工人會社聯盟的解散	101
六 愛森拿赫會議以後・施維澤爾的結局	107
第十三章 在議會中	117
一 北德意志立憲議會	117
二 北德意志帝國議會與關稅議會	123
第十四章 普法戰爭	129
一 宣戰之前	129
二 不倫瑞克黨委會之被捕	134
三 德意志帝國併吞亞爾薩斯—洛林	138
四 被捕	142
第十五章 議會的活動・叛國罪的審判	149
一 德意志帝國議會第一次會議	149
二 德累斯登大會・帝國議會第二次會議	153
三 在萊比錫進行的叛國罪審判	157
四 帝國議會的其他演說與“不敬罪”的審判	160
第十六章 在要塞中	164
一 漢勃土斯堡	164
二 哥尼斯坦	170
三 士維考	171
第十七章 由一八七一年至哥達大會	174
一 各國政府與社會民主黨	174

二 社會民主黨的兩派	176
三 一八七四年的會期	179

第十八章 從哥達統一大會至反社會主義法律

前夕	184
一 統一大會	184
二 餘波・我對巴黎公社的態度	187
三 更多次的起訴	192
四 一八七六年哥達的黨大會	194
五 一八七六至一八七七年的競選運動	196
六 一八七七年的哥達大會・選進薩克森議會・ “未來”報	199
七 入獄時機又成熟了	202
八 內政・在萊比錫監獄中	206

第十九章 執行反社會主義者法律的前夕

一 謀刺皇帝及其後果	210
二 第一次“特殊條例”或稱壓制條例	212
三 努畢林的謀刺皇帝及其結果・一八七八年的選舉	214

第一章

童年與少年時期

人是隨處可以誕生的。一八四〇年二月二十二日，當我在寶滋一堪倫的砲台的穹窖中看到了光亮的那一刻，我也享有了這種權益。我的父親，約翰·高脫樂勃·倍倍爾，是步兵第二十五聯隊第三中隊的一個下士，我的母親是威廉明娜·約翰娜，娘家姓西蒙。

說一些關於我父親和母親的事，並不是多餘的，因為是對於了解我的性格所必需的。我的父親是生在波森省的俄斯脫羅伏地方的一個桶匠的兒子。我想我的假定是對的：就是倍倍爾家約在宗教改革時，從日耳曼的西南部遷向東去。我確知有一家姓倍倍爾的，早在一六二五年就住在西利西亞的克呂慈堡；可是在日耳曼的西南部姓倍倍爾的人却更多。我父親遷回日耳曼西部的原因是因為他和他的學生兄弟奧古斯特——我的教父——一起被編入了普魯士——波蘭的一個聯隊；但是，當一八三〇年波蘭起義爆發時，普魯士政府便想最好還是把這些軍隊調離波森省。於是我父親的聯隊便歸屬於當時的梅因斯的聯合砲台。這一次的移動促使我的父親有機會和我的母親相識。

我的母親生於一個久已定居在前帝國自由市威茲勒城

的不甚貧窮的小資產階級的家庭裏。她的父親是一個麵包師兼自耕農。當家中人口增多時，我的母親便到法蘭克福去做工。她從法蘭克福又到了梅因斯，就在那裏終於認識了我的父親。後來我父親的聯隊重又駐紮在波森時，我的父親，爲討好他未來的妻子，也許因爲他喜歡萊因河西岸一帶的地方甚於他的故鄉，便設法調到常備軍的第二十五聯隊裏去，駐紮在寶滋—堪倫。他的學生兄弟奧古斯特——我的教父，跟着他學，調到常備軍的第四十聯隊去，當時駐紮在梅因斯。

那時候一個普魯士軍隊的下士的家庭只能在很困苦的情形下生活。俸給只是聊勝於無。在那些日子裏，普魯士的軍隊與官吏階層只能仰靠着很有限的收入過活；差不多每一個人都要忍饑挨餓，都要爲了上帝、國王與祖國束緊褲帶。說普魯士是忍饑挨餓而起家的這句話，是含有真理的。我的母親有某種營地售物的執照——也就是說，她具有售賣一些零星雜物和食品給士兵們的許可證。櫃台就在我們唯一的一間屋子裏。這情形現在仍在我的眼前，看她在菜油燈光裏，把半辨士一份的熱氣騰騰的煮洋芋盛到兵士的陶瓷碗中去。對於我們小孩子說來——那時我已得了一個弟弟——穹窖裏的生活正充滿了樂事。我們在好些房間跑進跑出，受着軍曹與兵士們的撫愛與調笑。等兵士們都出去了，我常常到我的教父溫脫曼軍曹的房間裏，從木栓上取下他的吉他來玩；我務必要彈得把弦全弄斷了才罷休。爲了減少這種毫無羈勒的練習的破壞性，我的教父用一塊木頭刻成一隻吉他形的東西，上面也裝上弦。這樣我

就能和我的弟弟，在寶滋大街的一個院落的門口坐上幾小時，來亂彈這些琴弦，以致引得住在街對面的騎兵中隊長的女兒們大爲高興，竟往往有時送給我們點心和糖菓來酬勞我的演奏。當然啦，軍事操練不許爲這種音樂練習的利益而受到妨礙；整個的環境鼓勵了軍事操練；它簡直是風行一時的。

可是我的父親漸漸地用另一種眼光來看兵士的生活了。的確正如我母親時常對我們說的，他是一個完全與衆不同的漂亮、規規矩矩、而又有良心的兵士；可是在那時他已經服兵役十二年多了，這種生活已經過够了，而且也厭倦了。顯然，他並不缺乏當時在萊因省地方特有的獨立與反抗的精神。好幾次，當他回到自己陰暗如穹窿的房間裏來時，他滿面怒容，嘴裏還在咒罵着。在經過十五年服役以後，他有好幾個月因爲很重的病，躺在陸軍醫院裏，面對着死亡與以後一家將忍受的窮困，他反覆地和很迫切地警告母親，在他死後，切勿將小孩送進陸軍孤兒院去，因爲一進去就必須受服役九年的條件的束縛。他還怕母親迫於無奈，也許還是可能這樣做，他就以那種由於病勢沉重而引起的激動一再地叫着：“如果你那樣做了，我一定在連隊面前把孩子們刺死！”他完全忘了，到那時他已經死了。

就某一種意義說來，我的父親在一八四三年年初，得到了拯救，他被委任爲邊防軍。他接受了委任，並且帶着全家，有時步行，有時乘坐裝載傢具的大車——因爲那時還沒有火車——到達了靠比利時邊境的一個小城漢佐根那特。

可是在那裏我們沒有住所。由於艱苦的守夜，我父親

却在三個月見習期尚未滿期之際患了很重的病。我母親把這種病叫作肌肉發炎；我想是風濕症；總之，肺癆跟着也來了。我父親既然見習尚未滿期，當然不能解除兵役，我們又須同着重病的父親一道照來時一樣回科倫去。對我母親說來，那真是苦日子。

在科倫父親被送入陸軍醫院，媽媽被配給了一間營房。十三個月後，父親死了，享年三十五歲，却並未留給母親請求撫恤金的權利。他死後不久，我們便不得不離開這間營房，若不是我父親的孿生兄弟奧古斯特·倍倍爾來照顧她和我們這幾個孩子，她還要被迫回到她的出生地威茲勒去。爲了更好地盡這份責任，他便在一八四四年的秋天，決定跟我母親結婚。我的繼父早在一八四一年九月脫離了軍籍，那是由於他先患了喉頭炎後來又轉成肺癆，結果失了音的緣故。他得了一份“撫恤金”，每月兩個泰勒，約合六先令。此後，他在梅因斯的一所陸軍醫院做了兩年巡警，後來又做了科倫附近勃勞魏勒一所感化院的看門人。一八四四年的夏末，我們在勃勞魏勒住了下來。這所感化院是由一大片房屋、院子、菜園空地構成的，四周繞着高牆。男犯、女犯、少年犯都分別監禁着。要進到我們的住處所在地的監獄屋子裏去，我們得穿過好幾座院落，打開好幾扇門得很嚴緊的大門。監獄是跟外面的人類世界完全隔絕了的。入夜，暮色初起，幾十隻大大小小的貓頭鷹便在屋子上飛翔，尖銳的鳴聲，使我和我的弟弟異常恐懼。這些貓頭鷹築巢在附近禮拜堂的墓園裏。就是不提這事，這樣的家也決非我們小孩子所喜歡的；就是對於我們的父母，依我的想法，也不會

滿意。那些囚犯是被虐待的；他們的呻吟、尖叫聲，在整座建築物內震盪着，當然使我與我的弟弟感到恐懼。

在勃勞魏勒地方，我被送入鄉村小學去，那時只有五歲上下。

那時生活非常單調，極大部分的時間被關在獄牆裏。我們的父親，生性就嚴厲，很容易發怒，這種傾向由於他的肺癆病的加劇而更厲害了。母親與小孩都爲了這緣故受許多氣。好幾次，當他激憤得發狂，已開始鞭打我們的時候，我的母親不得不奪住了他的手。若體罰是教育智慧的最高的流露，那我早該是一個卓越的人物了。不過誰敢如此武斷呢？不論我現在是怎樣一個人物，是和鞭打沒有任何關係的。

另一方面說來，我們的父親爲了我們，的確盡了最大的努力，因爲他到底是一個好心人。例如逢到聖誕節、新年或復活節，他爲使得我們高興，往往盡他微薄的收入所及地化費；當然即使如此，他所化的錢也是不很多的。除了供住處（兩間房間）、燃料和燈火以外，我父親還有八泰勒（合二十四先令）的月俸。這些錢得養活五個人。

我父親的病加劇得很快，一八四六年的十月十九日他死了。我的弟弟與我對於繼父的死，覺得是從壓迫下釋放了出來。不論那一次小孩子的自我表現，只要他認爲不當時就加以懲罰，那種嚇人的嚴厲，使我們一見他就發抖。他使得我們怕他。愛他，那是我們從來也沒有感覺到的。我母親怎樣忍受第二個丈夫的死亡，我不知道；不過這次不是一段快樂的婚姻。從這第二次的婚姻上，她又未得到撫恤

金。無可如何，只能回到她的故鄉威茲勒去。十一月初，我們又一次把我們所有的東西都裝上了車，出發向科倫去。那時天氣嚴寒，又下着雨。到了科倫，我們的傢具都卸在靠近河邊的道路上，候船運到珂勃倫茲，再從那裏裝車溯拉恩河流域到威茲勒。第五、六天我們才到那裏。

威茲勒住着我們的外祖母，我母親的三個姊妹和一個弟兄——他們都已結了婚。在這裏我們度過後半期的童年。我先被送進貧民學校，它所佔用的那所房子從前是屬於條頓騎士團的。在院落裏還存着那幢二層的樓房，就是歌德的“維特”裏的女主角，夏綠蒂·勃夫住過的。後來我碰巧，有好幾次睡在那座屋子裏，因為我的一個表姊做着這名勝夏綠蒂的房間的導遊人。我記得很清楚，一八四九年舉行的那次歌德百年誕辰的紀念會，就在維爾特巴哈泉水附近，從這次以後，這泉水便稱為歌德泉了，十年後在薩爾茲堡市府劇場舉行的席勒的百年誕辰紀念會我也在場。

幾年以後，這貧民學校歸併入公民學校（公共初等學校）。我們——從前貧民學校的學生——於是被稱為免費生。

在學校裏，我跟我的先生們處得很好。我是最好的學生之一，因此我的幾何教師，一個非常傑出的矮小人物，竟開始啓發我，使我與其他兩個孩子窺得了數學的奧妙。甚至我們還學會了應用對數表。較次於算術與幾何，我所喜歡的科目是歷史與地理。宗教指導對於我毫無意義，我也不大管它，而且在家裏我母親——一個開明而有自由思想的女人——也不為這事來麻煩我們。我之學習它，只是為